

信念的力量：从中央苏区到陕北 纪念中央红军出发
长征 70 周年论文集 本书编辑组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
社 2006 年 12 月

摇Ⅰ援~~援~~~~援~~~~援~~Ⅱ援~~本~~~~援~~~~援~~Ⅲ援二万五千里长征(灵瓌-灵瓌)
原纪念文集援Ⅳ援~~运~~~~源~~~~源~~

信念的力量 :从中央苏区到陕北
——纪念中央红军出发长征 70 周年论文集
本书编辑组编

陽月苑原裝園原裝園原裝園原裝園·源園搖定价 圓元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红军两大主力长征与长征精神	石仲泉(员)
永远铭记赣南人民对中国革命和中央红军长征作出的 摇摇巨大贡献——在赣州市纪念中央红军长征 苑园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石仲泉(猿)
缅怀红军长征伟绩弘扬红军长征精神 ——在赣州市纪念中央红军长征 苑园周年大会上 摇摇的讲话	潘逸阳(猿)
简析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因和准备	刘勉玉(源)
论苏区赣南省的设立及对中央红军突围长征的 摇历史贡献	曾懿华(缘)
红六军团的西征与中央红军的长征	邹耕生(远)
中央红军长征为什么选定于都作为集结地	胡日旺(苑)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时间考辨	王健英(愿)
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 摇摇时间和地点	黄鹏生(员源)
扎西会议的历史作用	熊摇英(员缘)
略论红军长征中的左、右两路军	肖摇 (员源)

铁盾断后显英雄

- 红九军团的长征足迹 曹树强(员源)
- 西北红军对红军长征的重要贡献 姚文琦(员藏)
- 略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对主力红军长征胜利的
- 摇摇历史贡献 姜廷玉(员园)
- 关于红军长征里程的几个问题 王新生(员西)
- 红军长征政治工作的再认识 秦摇力(员源)
- 红军长征途中的群众工作
- 以云南为中心的考察 许新民(员藏)
- 长征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 陈摇全摇张鲁鲁(员员)
- 中央红军长征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 凌步机(圆员)
- 红军长征与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 徐占权(圆园)
- 长征中“毛张周”领导体制的架构及其重大历史作用
- 纪念红军长征出发 苑园周年 余伯流(圆圆)
- 论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贡献 王春明(圆苑)
- 高超的指挥艺术 ,伟大的战略转折
- 评长征中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四渡
- 赤水战役 张树德(圆苑)
- 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的伟大贡献述论 黄少群(圆豫)
- 朱德在红军长征中的重大贡献 吴殿尧(圆远)
- 张闻天在长征途中的角色转换 曹春荣(猿圆)
- 彭德怀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 李东朗(猿原)

伟大的事业 需要伟大的精神

- 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七十周年 罗开富(猿愿)
- 论红军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及时代价值 万建强(猿园)
- 论发扬长征精神与牢记“两个务必” 唐摇斫(猿缘)
-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杨人平(猿源)
- 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 刘晶芳摇刘振清(猿园)
- 编后话 (猿缘)

红军两大主力长征与长征精神

石仲泉^①

悠悠八十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五十年。进行长征的 ,除中央红军外 ,还有红四方面军 ,红二、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这几个方面红军的长征 ,共同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伟大的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这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这几年 ,我萌生了“走走党史”的念头 ,并首先考察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些历史。一九四九年 苑月中旬 ,我又走了川陕苏区 ,在一九四九年了解红四方面军在川西长征的一些历程之后 ,对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根据地并由此开始长征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研。至此 ,我对这两支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大体走过了一遍。相比之下 ,对红二、六军团 ,特别是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史考察得比较少。因此 ,这里讲红军长征及其精神 ,主要以个人对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考察为基础 ,兼及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一些情况 ,讲讲个人对长征历史的一些看法 ,谈谈对长征精神的一些认识。

一、红军长征历程的基本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从 一九三四年至 一九三六年 ,历时两个寒暑 ,纵横十多个省 ,跨越万水千山 ,终于实现了从东南至西北的

^①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战略大转移,胜利走完了长征路。

红军长征,先后经历了三方面的严峻斗争。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中,共产党内部也发生了正确指导思想与错误指导思想的尖锐斗争。同时,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上述斗争的交错发展,使红军长征的两年历程显出若干阶段性。

我初步地将红军长征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在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执行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坚持错误的军事指挥,使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时,在湘江战役中遭到惨重损失。它教育了广大红军将士,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2月两河口会议。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军事指挥,改组了中央主要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四过赤水河,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初步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小金(懋功)达维实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这缘个月,中央红军长征尽管比较艰苦,但完全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是红军牵着蒋介石鼻子走且非常主动顺心的一段。

(三)从1935年2月两河口会议至2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在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逐渐膨胀,一方面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又伸手要权,直至另立中央,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分庭抗礼。从两河口会议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对张国焘作了仁至义尽的规劝和争取工作,同他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最后坚持北上路线,克服了过

草地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 ,到哈达铺之后 ,最终明确了进军去陕北并以此作为长征落脚点的方针。

(四)中央红军从 1935 年 9 月到哈达铺至 1935 年 10 月到陕北 ,胜利完成长征。中央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后 ,行动更为便捷 ,行军打仗更为顺利。中央红军于 10 月下旬到达吴起镇 ,11 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为中共中央将西北作为全国革命新的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五)从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这一年 ,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 ,努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而奋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南下 9 个月后遭到破产。在中共中央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以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的共同努力下 ,张国焘最终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先是与红二、六军团在 1936 年 8 月在四川甘孜实现会师 ,最后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宁的会宁、将台堡地区实现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长征任务。

上述划分 ,主要是根据红军长征两年历史进程的内容 ,每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的主要矛盾 ,以期使每个阶段的主题一目了然。这样划分 ,有的阶段的时间跨度长 ,有的则较短。比如 ,第四阶段从哈达铺到陕北只有一个月。所以将其单独为一段 ,是因为这一阶段任务单纯。当然也可以将其同第三阶段合为一段。合并的好处是 ,历史分段不显得零碎 ;其弊是在这四个月的历史阶段中会存在两个主题。前三个月主要讲与张国焘的分歧和斗争 ,后一个月则讲中央红军进军陕北。对这个问题 ,我也在考虑 ,换个角度 ,可将其视为一个主题的延续 ,即与张国焘进行斗争后中央红军没有拖累 ,长驱陕北。因此 ,将红军长征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也是可以的。

二、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问题

两年的红军长征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红军长征史上的许多问题,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都很清楚了。但也有一些问题仍存有异议,有的问题还可以深入挖掘。现就我接触到的一些问题谈点看法。

(一)关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中央苏区人民对长征的贡献。

在 1956 年 1 月我首次到赣南时,就开始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即长征问题进行考察。我写的红军长征系列文章,首篇就是《悲壮的战略转移》。有的问题在那篇文章中讲到了,有的没有涉及。这里,想再明确几点:

一是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加以一定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但是又不能混为一谈。进行战略转移,无疑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是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此前,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好的建议而未被采纳,到了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后,即使再采纳他们的建议,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局面了。因此,我以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能说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即长征也是错误的。

二是对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是没有任何准备。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中央书记处于 1934 年 8 月作出的。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是在 10 月。这期间所进行的转移的准备问题,可从两方面看:就红军主力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问题没在政治局讨论过,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

志事前都未与闻 ,这样大的军事行动 ,未开会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商量 ,致使整个高层党政军领导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 ,这既是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 ,也是有悖常理的。再则 ,这样大的军事行动 ,直至 9 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 ,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没有作战略上的全局筹划 ,有些准备工作是在 9 天内进行的 ,因而 ,不能不很仓促 ;有的又是搞“大搬家” ,什么都带上了 ,严重影响初期行军 ,这是违背战略转移的军事常识的。这是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 ,还要看到 ,从 9 月开始 ,先是派出红七军团北上 ,转战闽浙皖赣 ;又令红六军团西进 ,到湘西一带去找红二军团 ;此外 ,还派程子华去红二十五军加强领导。这些都应视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所实施的带有战略性的准备。红七军团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 ,红六军团西进带有探路性质。这两大战略性的决策 ,不看作是一种准备 ,是有失公允的。至于对他们没作明确交代甚至作出错误指示 ,那另当别论。此外 ,有些准备和安排也是很细致的。这么大的转移在地方和部队中没有造成大的混乱 ,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对保密问题 ,也不能简单指责。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即使在高层领导的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 ,也应当保密。否则 ,后果也难预料。当然 ,在极小范围保密时间过久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三是讲中央红军最后在于都集结出发进行长征同中央机关和红军各部分别从所在驻地出发进行长征 ,这两者不是矛盾的。我在《悲壮的战略转移》那篇文章中讲“于都是中央红军主力集结突围转移的出发所在地” ,并对为什么要选择“于都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集结出发地”进行了分析。此文发表后引起不同意见 ,似乎我否认了其他地方是红军的出发地。这是一种误解。当时 ,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 ,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 ,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 ,他们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 ,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 ,作好最后的准备 ,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段

历史,大家都清楚。因此,我说于都是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丝毫不存在否认其他地方也是“出发地”的意思。

四是不能以中央红军由于错误路线指挥,在撤出中央苏区的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来抹杀或淡化中央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进行长征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受挫是一回事,苏区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巨大贡献又是一回事。这两者不能混淆。在这两年考察赣南时,我深深感到这片红土地,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造化,还不如说是赣南人民用鲜血染就的。赣南苏区各县人民对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想说几个一直令我难以忘怀的数字。

——一个是赣南苏区整体。赣南是中央苏区的主体,当时的总人口为 400 万,有 100 万人参加红军,近 100 万人支援前线。这就是说,几乎全部青壮年劳动力都参与了保卫苏区的作战和支前的军事斗争。在红军长征出发时的 30 万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占中央红军总数的近 20%。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有 10 万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在湘江战役中所牺牲的绝大多数是新入伍的赣南子弟。一个地区,为革命作出这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全中国是罕见的。

——另一个是兴国县。兴国当时有 100 万余人,参加红军的达 10 万余人。兴国牺牲的有姓名的烈士为 10 万人。兴国籍烈士占全国烈士总数的 1/4,占江西全省烈士的 1/3,占赣南烈士的 1/2,为全国各县牺牲烈士之首。故兴国有“烈士县”之称。在长征路上,兴国籍战士牺牲达 10 万多人,这意味着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籍战士倒下。

——再就是瑞金。在长征前的多次扩红运动中,瑞金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至长征前,全县参军参战的有 10 万余人,其中参加长征的 10 万余人,参加游击战争的 10 万余人。在长征路上牺牲的也有 10 万余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瑞金后,远

作为“赤都”，它首当其冲地遭到反动势力最疯狂、最残酷的报复。全县被残杀的又有 1.5 万多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连国民党自己的报告也称：在“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杀之鸡犬，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赣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赣南对长征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应当浓墨重彩。纪念长征出发 70 周年是个很好的契机。

（二）关于长征途中的会议。

这里主要以中央红军为参照系，讲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召开的许多会议。据我的统计，可能不完全，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包括它的常委会和扩大会议，从 1934 年底至 1935 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在党史上有记载的就多达 100 多个。这些会议，按其讨论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来划分，大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这个系列的会议有 30 个。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这些会议基本上是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

二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它包括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 20 个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其中的批评、斗争，也是希望求得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但这些会议没有实现这样的结果。

三是与红四方面军分道后，中央红军在单独进军陕北过程中召开的系列会议。它包括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等 10 个。这些会议

就是不断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到达陕北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

这三个系列的会议,对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开辟新的革命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关于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对红军长征途中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我都作过考察,感到有一个党史上过去没有展开论述的问题,即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此前此后的一些会议对遵义会议起了怎样的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为了把握好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我提出了认识这些会议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员)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时空情况结合起来,不宜对历史问题作抽象的分析。(圆)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猿)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源)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据此,我认为,对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可以讲两句话: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其后的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讲“过程论”,遵义会议发生的历史伟大转折,应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讲“合力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的诸多会议都为推进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发挥了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无可厚非。讲“链条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都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就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

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军事领导方面),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因此,我认为,讲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应讲两句话,即: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

有人问,这两句话有什么样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

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据此,我以为对两个“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定位,将其作为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来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更为科学。

(四)关于彝海结盟问题。

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书上都是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讲的,但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的党史工作者对彝海结盟问题提出异议,有的书就不讲它了。这次走长征路,我专门对此作了考察。

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这是历史事实,不存在问题。党史研究的不同意见发生在彝海结盟之后,小叶丹所在的冕宁县,在中共冕宁县工委领导下成立了公开的武装组织冕宁县抗捐军,在红军大部队走后,彝族奴隶主武装袭击了通过彝族区的抗捐军,队伍被冲散,负责人多数被害,随后,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这个红色政权亦瓦解了。小叶丹领导的那支武装,有些人参与了袭击抗捐军的活动。据此,有的党史工作者对小叶丹持否定态度,认为参加攻打抗捐军是叛变革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如何评价小叶丹和要否继续宣传彝海结盟的问题。

这件事主要发生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很重视这个问题,指示有关部门对小叶丹家族参加攻打抗捐军一事进行调查。根据省州县的多次专题调查,都还作不出定论。四川省委负责同志讲了这样三点意思:

第一,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帮助红军粉碎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阴谋。这个功绩不能抹杀。解放初期,刘伯承曾对时任中共西康区党委书记的廖志高讲:要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当年与小叶丹结盟就是我们重视民族工作的结果。彝海结盟是报告了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

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 ,就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彝海结盟 80周年时 ,廖志高在一封信中也说 ,彝海结盟对中国革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功不可没。

第二 ,在几支黑彝家支武装中 ,小叶丹领导的果基家支对国民党的斗争最多。他们一直按照当年刘伯承讲的“一个指头没有劲 ,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就力量大了”的话 ,联合其他黑彝家支的人 ,共同抗击国民党军。这种斗争应当肯定。

第三 ,在后来与其他黑彝家支的械斗和与川军地方武装的斗争中 ,小叶丹和参加果基支队武装的彝民的许多财物都丢掉了 ,却千方百计地保存刘伯承赠与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小叶丹对妻子和弟弟说 :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 ,不要忘记共产党红军的恩情。“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刘伯承我信得过 ,他绝不会骗我 ,万一我死了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 ,将来把它亲手交给红军。”1935年 缘月下旬 ,小叶丹在国民党地方头目挑起的彝族内部械斗中身亡。1936年 缘月 ,冕宁县解放。果基家支的彝民群众找到驻军司令部 ,小叶丹的妻子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献给政府。小叶丹家族对共产党的这种态度是很好的。

我认为 ,有关方面对小叶丹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小叶丹不是共产党员 ,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组织的头头 ,我们不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这个少数民族首领 ,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 ,也要从实际出发作具体分析。我们写党史对小叶丹这个历史人物要予以肯定 ,写红军长征还是要讲彝海结盟。这是党和红军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一个典范。

(五)关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问题。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 ,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过去讲得不多 ,对其长征讲得更少 ,因为张国焘分裂党、成立第二中央 ,就是在长征中发生的。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史 ,不是专门研究者 ,一般不甚了解。尽管目前有一些这方面的论著 ,但总的说影响有限。我在 1984年

苑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随后的长征作了重点考察之后,才深切感到过去的研究和宣传相当失衡。应当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呢?我初步地考虑了这么几点:

——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 1935 年底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到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高度评价了川陕根据地的历史作用。他说:川陕苏区有地理上、资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在中央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先后展开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两大战役。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就致电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对挥师策应作了多方努力未果后,最后决定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以策应中央红军。1935 年 7 月,红四方面军进军嘉陵江,实际上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得喘不过气来,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军是个重要的牵制,对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起了有力的缓解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来电后,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当然,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如蒋介石以两百个团的兵力实行“川陕会剿”,四方面军背腹受敌;川陕根据地在两年多打了十六个月大仗,再加上张国焘推行鄂豫皖时期那套“左”的政策,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乎耗尽等。但如果不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红四方面军准备直接出西北

方向,另作他图了。因此,对红四方面军长征坚持了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这一点,应予充分肯定。

——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进入松潘、理县、茂县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过冕宁,正向大渡河挺进。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在望。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将迎接中央红军作为首要任务,并进行三项重要准备:一是确定由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等率先遣队西进懋功地区,扫清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到此有一个安全通道。二是要求各部队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等,作为慰问品;并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随先遣队走,待两军会师后补充给中央红军。三是要求广大干部和战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红四方面军在筹集到一定数量的物资后,先头部队即出发西进,星夜兼程,于远月上旬攻克懋功(今小金)县城,抵达维镇。远月 5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远月 6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过雪山,受到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热烈欢迎。达维会师后,两支部队的指战员相互间开展慰劳活动。红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从茂县、理县送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这些慰劳品,最难得的是筹集到的数十万斤粮食,还有上千件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李先念和傅钟分别给了聂荣臻和邓小平一匹骡子和马。中央红军的同志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的同志。邓小平后来说: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件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的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了 1 个团,近 2 万人,充实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毛泽东讲